



樊昌信 教授

校园纪事

—— 清华、北大、育英、西电与我

樊昌信 著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xduph.com>

西电名老专家文集

樊昌信教授校园纪事

——清华、北大、育英、西电与我

樊昌信 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樊昌信教授校园纪事/樊昌信著. -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06 - 3992 - 5

I. ① 樊… II. ① 樊… III. ① 回忆录—作品—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7279 号

策 划 阔永红 聂梦麒

责任编辑 高维岳 杨 薇

出版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南路2号)

电 话 (029)88242885 88201467 邮 编 710071

网 址 www.xduph.com 电子邮箱 xdupfxb001@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单位 陕西百花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 数 16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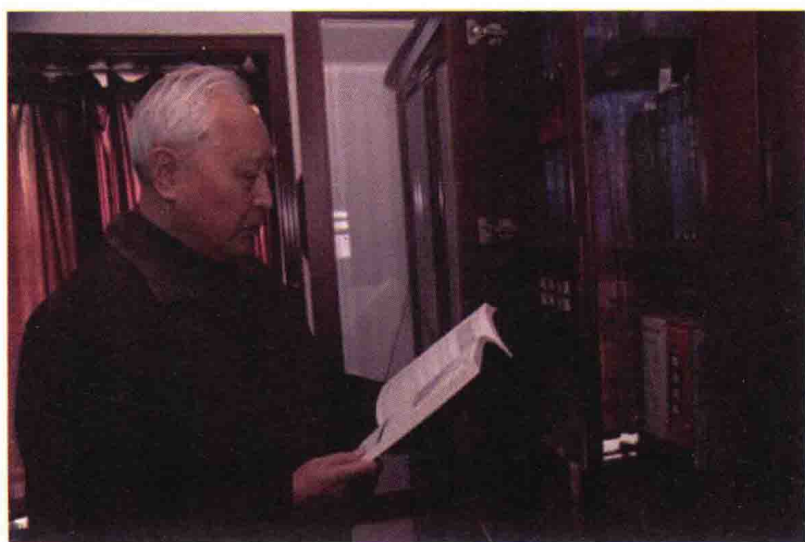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88.00 元

ISBN 978 - 7 - 5606 - 3992 - 5/I

XDUP 4284001 - 1

*** 如有印装问题可调换 ***



(摄于2014年12月)

前 言

我的一生只和学校有缘。在四所学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充满了我的全部记忆。我在北京大阮府胡同小学读完四年初小，在北京育英学校读完两年高小和六年中学，大学则在北大上了四年本科。毕业后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及其前身）工作了一辈子。我的家族也与学校有缘。我父亲在清华工作了十八年，二伯父也在清华工作多年。我的四个姐姐出生在清华园。我曾两次报考清华大学，虽然曾被录取但没有去报到，而是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毕业后北大工学院（除化工系外）与清华合并，这样一来，我除了是正宗的北大校友外，又成为没有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的清华校友。我的大姐和二姐也是北大毕业的。我的本家姑父（冯祖荀）和本家堂兄（樊际昌）都是北大知名教授。因此，清华和北大这两个校名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和言谈里。我的回忆内容很多都和这两所名校有关，同时也和育英及西电有关，自然也涉及不少和这四个学校没有直接关系的我的经历。

樊昌信

2015年8月

目 录

一 我的根在“天堂”	1
二 上小学和“七七事变”	7
三 中国现代养殖农业的先驱虞振镛 ——“七七事变”后南迁亲友之一	13
四 西南联大教务长樊际昌 ——“七七事变”后南迁亲友之二	16
五 我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冯祖荀 ——“七七事变”后留京的亲友之一	19
六 我国现代速记法的创始人汪怡 ——“七七事变”后留京亲友之二	25
七 “七七事变”后留京的其他亲友	28
八 北京沦陷后的家	29
九 育英学校	38
十 育英的教学和老师	44
十一 我的“不治之症”	49
十二 我的两个台湾姐夫	51
十三 上大学	54
十四 我的大学老师	63
十五 大学生活	68
十六 大学毕业参军	74
十七 镇反运动	80
十八 向苏联学习和部队正规化	82
十九 1957 年公私两件大事	90
二十 学校搬迁	95

二十一	学校分家·····	100
二十二	转业和文革·····	102
二十三	三次下乡·····	105
二十四	复课和科研·····	111
二十五	改革开放·····	120
二十六	寻亲·····	127
二十七	国际学术交流·····	128
二十八	解体前夕的苏联·····	138
二十九	欧美印象·····	146
三十	生平第二次住院·····	150
三十一	八十岁生日·····	152
三十二	丰收的二十年·····	155
三十三	旅游杂谈·····	160
附录一	主要著译及论文目录·····	177
附录二	荣誉称号及获奖·····	189
附录三	工作经历·····	192
附录四	年表·····	197
参考文献	·····	198
跋	·····	199





一 我的根在“天堂”

1931年9月12日(阴历八月初一)我出生在北京市,家中除父母外,还有四个姐姐,一个过继哥哥,一个堂兄,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县。从上小学开始,我填表把籍贯都写为杭县,但是杭县和杭州



1932年的我

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都不清楚。直到最近,经查资料才晓得:在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钱唐郡改置杭州,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杭州这一地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1949年5月杭县解放,建制未变。1958年4月,杭县被撤销,属杭州市郊区。由此可见,籍贯写为杭县应该是我父亲在民国初期按照当时的地区建制划分而填写的。

听父母讲我们的老家在杭县的豆腐三桥,今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斗富三桥,此桥在靠近杭州火车站的东河上。传说在南宋年间,安乐王王佐为方便百姓,在东河上造了一座“安乐桥”。宰



今日的斗富三桥

相秦桧听到很嫉妒，为和王佐斗富，就在安乐桥附近并排造了三座桥，并亲自取名为“斗富一桥”、“斗富二桥”和“斗富三桥”。老百姓取笑秦桧，就将那三座桥称为“豆腐桥”。

父亲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名澄宽，字季清。兄弟三人，父亲排行第三。据说，我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死在考场上，所以我的祖母坚决不让我父亲再去赶考了。在清朝，我父亲毕业于武昌书院(据说当年中国学校传统名称是：蒙学相当于小学，中斋相当于中学，书院相当于大学)。后来随亲戚汪怡(1875年生)去辽宁营口工作了一年左右，然后在民国元年(1912年)，和二伯父一起来到北京刚成立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工作。当时同事在背后分别叫他们两人大樊先生和小樊先生。

二伯父在清华图书馆工作。父亲在清华工作了18年(从1912年到1929年)，开始时任会计，最后是斋务主任。当年清华的斋务主任管的事情面很宽，有关学生管理的事情都管。从我家中存放的父亲的笔记本中可以发现有关困难学生向学校借钱的记录，有学生某月某日在饭厅吃饭时说话的记录。当年学生在饭厅吃饭时禁止说话，我推测是我父亲根据孔夫子“食不语，寝不言”的教诲制定的饭厅守则。除了管理学生的事务外，父亲也介入学校的其他工作，例如清华第五任(1922—1928年)校长曹云祥于1923年日本发生地震后，曾“委托麻伦、杨梦赓、何林一、王绍甄、樊季清、戴孟松六位教师和胡敦元、施滉、何鸿烈三位学生协助，组织日本赈灾委员会”^[1]。



曹云祥

我的母亲陈丽真，于1895年出生在苏州，8岁后迁居上海。她没有读过书，但是很聪明，自学认识一些简单汉字，像“王”字，当然还有复杂的，比如“樊”字，麻将牌上的“东西南北万中发”自然也熟识。此外，由于和一些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清华教授的夫人交往，学会了一

些英文单词并会和她们一起打美国扑克“梭哈”(英文 Show Hand 的音译,正式名称是 Five-Card Stud),还和她们一起,跟马约翰学打乒乓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生活品都是凭票供应,政府发给每家许多种票证,例如不同尺寸的布票、不同斤两的粮票、各种副食票等,不少文盲老太太分不清,常来向她请教。



布票



粮票

我父亲是杭州人,母亲是苏州人。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我似乎是来自天堂,但不幸的是,我出生一周后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接着是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不断的各种“运动”,一直不得安宁,直到半个世纪后,我才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家的堂号是“希圣堂”。“希圣”二字可能出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修养论,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年轻人大多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堂号”。

我家在清朝时期是官宦人家。我记得家中藏有几张祖宗的画像,平时卷起放在柜子顶上。一次父亲偶然打开,我看到上面画的是穿官服的人像,有戴“红顶子”的,有戴“蓝顶子”的,据说戴“红顶子”的是清朝一二品官员,戴“蓝顶子”的是清朝三四品官员。我看到关于夏衍的书中写有夏衍的回忆^[2]:“大姑母嫁樊家,住在杭州斗富三桥;二姑母嫁李家,安徽人氏。樊、李两家都为官宦人家,大概是道台、学台或是抚台一类的官员。”由此看来,我家和夏衍家有点儿亲戚关系。

我父母住在清华园 18 年期间，共生育了 5 个女儿。在父亲离开清华后我才出生在北京市内。因第三个女儿夭折，所以家中通常说我只四个姐姐。由于家中一直没有男性后代，父亲将本家的一个儿子过继到我家，成为我唯一的哥哥（原名樊际龙，过继后改名樊广信）。我二伯父唯一的儿子名樊守信，他在 4 岁时父母双亡，此后他就由我父母抚养。这样，我的父亲就需要抚养 7 个孩子，这也是“七七事变”后，无法拖带许多孩子去南方逃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家男性名字的排辈出自《论语》。《论语》“阳货第十七”篇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孔子解释什么是“仁”。我家的排辈分就按“恭宽信敏惠”这五个字。我父亲是“宽”字辈，我是“信”字辈。



1941 年照的全家福，摄于北京黄城根 14 号

（前排右起：母亲陈丽真、我、父亲樊季清；后排右起：三姐樊毓瑛、大姐樊慧英、二姐樊秀瑛、哥哥樊广信、四姐樊美瑛、堂兄樊守信）

1912 年至 1929 年，父亲在北京的清华学校工作期间住在清华校内当年称为“南院”的地方。那里今称“照澜院”，都是一些平房构成

的四合院。1990年，我的大姐从台湾回来，要我带她去清华“寻根”，她指出照澜院东南角的小院就是我家当年的住处（去看时已经是眼镜店了），还清楚地记得并一一指出梅贻琦、赵元任和马约翰等的家。后来清华还建有一些西式的二层小洋楼，供美国教职员住。1956年，我随我校代表团一行数人从张家口去清华大学“取经”。清华校方安排我们住的就是这种二层小洋楼，当时这座小洋楼大概是作为招待所用的。记得校长蒋南翔当时住在另一座类似的小楼。那次我曾到清华无线电系常迥教授家拜访，他家就住在照澜院的一个四合院内。我第二次见到常迥教授已经是1982年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了，他和我谈起文革中交白卷的“张铁生事件”后在北京“考教授”的事。一天，他接到通知，要求进城开重要会议，必须带笔做记录。去后得知原来是要考这些教授的数理化基础。他说钱伟长的物理考了一百分，他的化学考题中有一道题是考尿素的分子式，他说：“我上中学时，还没发明尿素呢！”（注：那时尿素已经发明，但是还没有进入教学内容。）此后，至1991年他去世我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可敬的教授。



常迥

我出生在国家多事之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一周，这时我家已经从清华园搬到城里了。1933年至1934年，全家随父亲迁往绥远省（现内蒙）萨拉齐县。父亲是随在清华工作时的好友虞振镛去那里的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工作，参加修建民生渠水利工程，虞振镛当时任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那时，中国的农村是极端贫困的。我家到萨拉齐县后，在当地似乎是大富豪，而实际上只是从北京来的一个普通的工薪人家。然而和当地普通人家比较起来贫富差距极大，所以家中不得不雇请一个带长枪的保安，每天夜里值班，以防止强盗小偷入侵，这个保安在夜晚有时会开枪以吓走房顶上出现的蟊贼。即使如此，在夜间还不时会听到房顶上有人走动的声

音，曾经有贼人在夜晚进入室内偷盗，吓得我父母在卧室不敢出声，任凭贼人偷走一些不很值钱的东西。

一年多后，父亲又回到北京，在中国华洋义赈会工作。这时中国华洋义赈会的地址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菜场胡同，所以我们家就在菜场胡同租房居住。1936年起我就近在大阮府胡同小学开始上一年级。菜场胡同在今天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侧，大阮府胡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侧。





二 上小学和“七七事变”

大阮府胡同小学是一所平民化的市立小学，规模不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复式教学”，即一、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三、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坐在教室的左右边。每节课上，老师给一半学生讲课时，另一半就坐在原位上写作业或自习。所以实际上学生只有一半时间在听课。老师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上学早，一年级开学时我才不到五周岁，所以许多事情印象不深。记得在二年级时，一天适逢大雪天，语文老师应景说了一首打油诗：“大雪纷纷涌，房上没瓦垄，黑狗变白狗，白狗身上肿。”因为通俗易懂，因景生情，所以很容易记忆。“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要求小学生二年级起学日文。从此开始学了七年多日文，直至抗战胜利。

大阮府胡同小学传达室的工友有个传统，每逢端午节和中秋节都要向小学生要“节钱”。到那天早晨上课前就站在学校大门口，向每个进门的小学生伸手，没有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我都要提前一天向家长要点儿零钱，应付这一关。平时我的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后来转到育英学校后就没有这个规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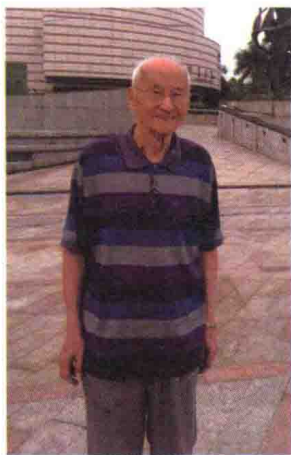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在卢沟桥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军队入侵，北京沦陷。这时我父亲的不少好友和亲戚都向南逃难。我父亲因为有七个孩子拖累，向南走也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来源，所以只能留下来。父亲的一个清华好友（李广诚，曾任清华庶务长）临去南方



清华庶务长李广诚

逃难时，把他租的房子让给我家续租，因为他家的房子比较好，有自来水和卫生间，而我家当时住的菜场胡同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所以就搬过去了。在那个年代，北京市内的许多房子是没有自来水的，用水要靠水车每天送水。一般的水车是人力推的独轮车，木制独轮车两边各有一个木制水箱。水车走来吱吱作响，并且一路滴水。吃这种水的人家先用钱买来水牌（手指粗细长短的小竹牌），然后每天再用水牌换水。我家住在黄城根时左邻右舍都没有自来水。在我家墙外就有一口水井，经常有水车来从井中打水送到各家。

李广诚夫妇很喜欢小孩，他们有多个子女。我的大姐和二姐小时候常到他家玩。我家搬到绥远萨拉齐县期间，二姐为在北京读书就寄宿在李家。很难得的是，我最近居然从网上找到了李广诚的一个儿子李增德的信息。李增德生于1917年，我于2014年再次联络到他时，他已97岁，仍然身体健康，居住在广州儿子家，并且能每天上网，和我经常用电子邮件联系。



李增德（摄于
2014年5月）

新搬去的房子地址在东安门黄城根（现在的地名改为东黄城根南街）14号。此地距离我上学的大阮府胡同稍微远些，所以在我初小毕业后就转学到较近的灯市口大街育英学校，在那里从高小（五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搬家后不久，听说日本人会到各家入户检查抗日物品，家中就彻底查找有关抗日的书籍和期刊杂志，集中在院中焚烧。在家中的堂屋墙壁上挂有四个条幅，我记得两边的是梁启超给父亲写的对联，对联的上联是“大开户牖纳



梁启超

新气”，下联记不清了，中间两个条幅中有一个是父亲特别挂上的大书法家郑孝胥写的条幅。因为“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满洲国成立，郑孝胥是满洲国首任总理大臣，是亲日派、大汉奸，父亲希望一旦日本人来搜查时，或许它能起一点儿护身符的作用。顺便提及，交通银行招牌上的四个汉字正是郑孝胥所题的。



郑孝胥



郑孝胥的书法

我家住在黄城根 14 号期间还遇到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震惊中外的事件。在 1940 年 11 月 29 日上午，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麻克敌和邱国丰在北京街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男爵和乘兼悦郎中佐，致使一死一伤。由于日方追捕中，误将麻克敌姓“麻”当作脸上有麻子的人，导致不久就发生了日军在北京满城抓“大麻子”的事情，造成麻子都不敢上街了。此事发生在“东黄城根 14 号”门前。按照当时北京的地名，东黄城根在锣鼓巷附近，在黄城根的北边。所以那段时间，有几次日本军人骑着高头大马和地方人员一起来误敲我家大门进行调查。这两个地名也常被本地人混淆，所以父亲写信时都把地址写成“东安门黄城根 14 号”以免混淆。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以讹传讹，把当年刺杀日皇特使的地点在网上写成“黄城根 14 号”^[3]。若不是我当年就住在那里，亲身经历，恐怕今后无人能发现此错误了。

从我家向北走不太远就到了沙滩，那里有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祥地北大红楼，但是日军占领北京后，红楼被日军占据作为日本的宪兵司令部。红楼的地下室中就关押着被日军抓来的抗日或有抗日嫌疑

的中外人士。宪兵司令部大门在路北，门外经常有两名日本大兵站岗。我经过那里时从来不敢在门前走，而是在马路南边走，非常怕日本兵找麻烦。

“黄城根”的地名是推翻清朝进入民国后由“皇城根”改成的。北京城以三道城墙围出了紫禁城、皇城和内城三个部分，在内城南还有外城。紫禁城即如今的故宫；内城城墙，即在如今的二环路所在位置；紫禁城和内城之间则是皇城。皇城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即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这四个地名今天仍在，除天安门外其他三个门都被拆除了，只有今天的“东安市场”仍保留着当年东安门的踪影。皇城的城墙从民国初年起就陆续被拆除，至1927年就全部拆光了。我家搬到黄城根时，已经看不见皇城了。黄城根大街是南北走向，我家位于黄城根大街的东侧。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是已经拆去了的城墙的遗址，所以是长长的一片空地，那里当年是我放风筝的好地方。城墙遗址的西侧是一条小河，河边小路称为北河沿，小河向南流到东安门附近就变成暗沟了。今天这段小河也已经变成暗沟了。我每天去大阮府胡同上学，有时走黄城根大街，有时为了好玩，就沿河走北河沿。日本人来了几年后，我家对面的空地被日本人的工厂占用，用铁丝网围起来，在里面盖了简易的库房，我放风筝的地方就没有了，不过即使有地方放风筝，也买不起风筝了。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消息传来，老百姓马上把日本人的这个仓库抢劫一空，连房子和铁丝网都拆得一点儿不剩。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后，除了日本军人外，还来了不少其他日本人，包括在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中任职的日本人及其家属等。随之而来的还有朝鲜人，因为当时的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已经被日本同化了，朝鲜人也都说日本话，中国人都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常常仗势欺人。不过一般中国人分辨不出日本人和朝鲜人。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主要是网罗亲日华人以组织伪政权，以及搜捕公开和潜在的抗日人士。我在家中常听到家人在偷偷地说某某人